



近代史资料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10

(近代史资料. 第六十册)

ISBN 7-80198-588-5

I. 近... II. 中...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2751 号

近代史资料 第六十册 Jindaishi Ziliao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责任编辑: 范红延 兰 涛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nipr.com>

邮 箱: zscq-bjb@126.com

电 话: 82000860 转 8324

传 真: 010-82000890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印制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7.7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189 千字

定 价: 4000.00 元 (共 100 册)

ISBN 7-80198-588-5/K·00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近代史资料》丛书出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创刊于 1954 年，至今已出版 114 期，现知识产权出版社将本刊自创刊号至 100 期结集重印出版，实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办了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大好事。

《近代史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久的刊物之一。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本所成立之初，范文澜所长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组织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同时，于 1954 年在本所成立以荣孟源同志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郭沫若院长亲自题写了刊名。

《近代史资料》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唯一专门刊载中国近现代史文献资料的期刊，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和推动其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一定声誉。但它曾两度停刊和复刊，且由定期改为不定期，致使一般读者和科研单位，很难将已出各期搜集齐全，今百期结集重印出版，实有必要。

近代史研究所历来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以此推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范文澜、刘大年、黎澍、李新等前辈史学家，对此备加关注。《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就是在范老直接关心指导下成立的。

自创刊以来，《近代史资料》陆续刊出 1840 至 1949 年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俗风情、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其中有档案、函电、日记、

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调查报告、照片、拓片等原始资料，还有年表、统计表及资料考证著作，以及外文相关资料的译文。《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从创立至今，以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为主旨，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仅是该室任务之一。很多列为国家、院、所重点项目的大型资料丛刊、资料集，都是历届所领导提出课题任务，《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牵头承担，并组织所内外专家学者完成的。这类专题资料集均先后多次获得国家和社会科学院的图书奖、优秀科研成果奖及省部级奖项。所以说在此五十多年间，本室共编辑出版了约 1.1 亿字的史料书刊，这包括期刊、专刊、大型丛刊、汇编、资料集等数十种，其中如《近代稗海》、《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等大型史料集，所收入的多为稿本、孤本、珍本和中外文档案文献资料，深受学界、学者的关注和好评，成为学者和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用书。

然而，因为这些史料书均出版于多年前，坊间早已很难寻觅到它们的踪影了。作为几十年从事近现代史料编辑工作的老编辑，我衷心地希望这些丛刊或资料集也能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若有可能再版，实乃嘉惠学林之善举，功德无量。

章伯锋

写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

怀念荣孟源同志

荣孟源同志是山东宁津县人，一九一三年出生。一九三一年进入北平中国大学读书，适值“九·一八”事变发生，在高涨的抗日救亡活动的影响下，他毅然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三二年参加反帝大同盟；一九三五年参加“一二·九”运动，在北平和家乡从事革命斗争。一九三六年他和其他同志由北平回到家乡宁津，领导“抗日会”，发展抗日武装。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荣孟源同志奔赴山西参加八路军。一九三八年转赴延安，先后在边区师范、行政学院任教。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荣孟源同志在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当教员。一九五〇年起，荣孟源同志从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转到新创建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学术委员、研究室主任并主编《近代史资料》。荣孟源同志生前曾经担任或兼任的其他学术职务有：辅仁大学、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史学会理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大辞典近代史分册主编，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荣孟源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历尽艰辛，为党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在历史研究领域，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是我国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建国初期，史学界面临着组织队伍和理论建设的重大任务。荣孟源同志协助当时的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同志在史学界积极进行学术组织活动，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的开展。一九五〇年，他创办并主编《进步

日报》的《史学周刊》专栏，利用这一阵地，他组织发表了大批史学论文，为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几十年来，荣孟源同志进行了大量的历史研究工作，获得了重大成就。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协助范文澜同志修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册）和《中国通史简编》。他自己撰写和编辑了《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资料与历史人物》、《国贼蒋介石》、《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中国近代史历表》、《中国历史纪年》等多种学术著作。荣孟源同志的这些著作及其论文，对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发展，对于引导读者正确认识我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历史，起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一书，早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即由朝鲜和日本学者译成朝鲜文、日文出版，传播甚广；他所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历表》，至今仍是史学工作者所常用的工具书。

荣孟源同志对近代史资料的搜集编纂工作，倾注了巨大的精力，这是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的又一重要贡献。自一九五四年《近代史资料》创刊以来，他一直是这一刊物的主编，至今已编辑出版了期刊五十九辑、专刊二十一种，约计有二千数百万字。聚沙成塔，造福后代。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荣孟源同志参加了其中《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三种资料书的编辑工作。他从五十年代初起就潜心搜集、研究孙中山的著作和各类函电文稿。一九五六年，他受有关方面委托编辑并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孙中山选集》。荣孟源同志在搜集、整理近代史料方面，是一名勤奋的创业者，即使卧病在床，仍念念不忘史料编辑事业。象他这样一位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如此关心并几十年亲自从事史料编纂工作，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荣孟源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几十年革命生涯

中，曾经几次遭受挫折和打击，政治上长期蒙受不公正的对待。在逆境中，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对党忠诚不贰，对党的事业怀有坚定的信念，始终积极热情地坚持工作，显示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品格。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于史学研究工作和史料编辑工作。他不顾年事已高，到全国各地讲学和搜集资料。在短短的几年内，他出版了《蒋家王朝》、《历史笔记》等著作，并根据他多年对中国历代历法和近代史资料的研究，撰写出《隋唐五代历表校记》和《史料与历史科学》，修订了他研究《史通》的文稿，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七十余篇文章，并负责主持编辑《中国历史大辞典·近代史分册》以及大型史料丛书《近代稗海》，形成了他晚年从事著述活动的一个高潮。

荣孟源同志对党忠诚不渝，对工作严肃认真，对同志亲切近人，对后学者热情扶植。《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的同志，在他的帮助指导下，政治上和业务上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荣孟源同志是一位可尊敬的史学前辈，也是我们的一位良师益友。

一九八五年夏，荣孟源同志不幸身患癌症，医治无效，于同年十一月十一日逝世。他的去世，是我国史学界的损失，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专家和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好党员。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而深感悲痛。

我们编辑部的全体同志，将以他积极热情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治学作风为榜样，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努力办好刊物，为发展和繁荣我国历史科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

1985年11月

历史学家荣孟源访问记

夏季的一天，记者来到中国美术馆附近的一座老式住宅，访问了著名历史学家荣孟源先生。荣先生今年七十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像许多中国人一样，荣先生是热情好客的。客人来访，老先生总是亲自沏上一杯清香的绿茶，摆在客人面前。

记者环顾住室内外：五间一排的老式平房，坐北朝南。中间三间通联的屋子里，叠放着许多老式书阁，从墙根直到天花板；茶几上是一摞摞待审的书稿。透过竹编的门帘，看到小天井里种着些花草，还有一株高大的核桃树。荣先生说，那还是三十多年前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从解放区来到北京时，亲手栽种的呢。

荣先生长期担任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室的领导职务，主编《近代史资料》杂志——期刊和专刊。荣先生从书架上取下几册向记者介绍说：“这些期刊和专刊起到了‘保存资料’的作用。那里面收集的都是社会上少见的早已绝版的书和文章，或中国近代史上名人的原始手稿、回忆录、见闻、日记等极其珍贵的史料。期刊第四十四号登载的清代末年著名进士文廷式的《闻尘偶记》，是一篇记述当时政事、轶闻的杂录笔记。文廷式曾当过光绪皇帝宠爱的珍妃的老师，是一位赞助变法图强的人物。这份原件是由文廷式的后人捐献给近代史研究所的。最近出的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因为第一次集中地把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革命活动的历史资料汇集成书，受到了有关方面人士的赞赏。其中已经回国的美国旧金山华侨温雄飞写的《回忆辛亥前中国同盟会在美国成立的过程》一文，记载了辛亥革命时期美国华侨的思想动

态，华侨青年响往革命，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支援国内革命运动等事迹，具体生动，可补充史实记载的不足。尤其是一九一二年元旦旧金山华侨庆祝辛亥革命胜利大游行的照片，很是珍贵。

除了主编《近代史资料》杂志，多年以来，荣先生还参加了中国历史学会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工作。对于这部丛刊，美国的费正清博士曾高度评价，说它“帮助美国培养了二百个博士”。《丛刊》按历史事件，编成十二种书，每一种书又有好几个分册，实际上收集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十二个重大事件的全套史料。荣先生参加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种书的编辑工作，并正在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近代史分册》。

因为荣先生对于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工作有着特殊的热忱和丰富的经验，而且成绩卓著，所以人们尊称他为史料学专家。

记者请荣先生谈谈史料工作的意义。荣先生说：“这是很容易明白的。研究历史和研究别的问题一样，都要详细地占有资料，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分析，从大量的真实的历史资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我们做资料工作，也就是为研究历史的人提供这种方便。”

荣先生说，当然不能把历史学的研究工作和资料工作割裂开来。一个人不能光靠别人搞资料，自己一点儿也不搞，这样他的研究工作就很被动；而搞资料的人也不能完全不参加研究工作，因为只有在研究工作中才能知道资料的重要性、它的份量和价值。荣先生经常指导编辑室的同行们，在编辑历史资料的同时，写出有关的研究论文。荣先生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早年他协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后来又不断写出自己的专著：《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历史人物评论问题》。不久前，他的《蒋家王朝》一书又第三次再版了。他的书，不管是学术著作还是普及读物，都具有史实丰富、论点鲜明的特点，

总是能给读者以启示。

对于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历史资料，荣先生有许多想法。他说：“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这一段中外关系的历史资料很重要。我们不仅要重视中国方面的资料，还应当把外国的部分，不管是官方的、私人的、还是教会的，都收集起来；既应当把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租借地、洋行、海关、商会的材料整理出来；还应当把散见于国内各地的甚至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材料等等，整理出来。这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都是有意义的。”

谈到这里，荣先生强调说，正因为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所以，培养这方面的人材是我们老一辈人的责任。

荣先生的资料编辑室有八位研究人员。这些人都比荣先生年轻。他们既是他的同事、助手，也是他的学生。甚至一些中年人都听过荣先生专门为他们办的讲座。对于刚刚到这里来工作的年轻的大学生，荣先生更是特别地关照他们，教他们怎样识别历史资料的真假和估价它们的价值，还教他们整理历史资料所需要的各项基本知识和技能等等。

荣先生有着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记忆力。他不仅熟悉正史，对于正史上不见记载的旧时代中国社会的各种知识都很熟悉。这些，再加上他的健谈和好客，他的家里常常是宾客盈门。有时是学者、作家来访，有时是导演、演员来请教。六十年代，他还为描写一位农民起义领袖的历史影片《宋景诗》担任过历史顾问呢。

荣先生虽然十分忙碌，但是精神很好。因为年龄的关系，他已患有轻度的心血管病。为此，他不再吸香烟，注意了身体保健。他告诉记者，尽管他已是古稀之年，但作为一位有着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他要继续为党工作。除了主持《近代史资

料》杂志的编辑工作，写出他的《中国历史纪年》等著作之外，他还想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做一件大事，就是广泛收集那些流传不广或十分难得的野史、别集、当时人的笔记、日记、游记、见闻录等等，编成一套大型的有关中国近代历史方面的资料丛书——《近代稗海》。现在，他和他的助手们已经把第一编十集。包括六、七十种材料选出来了，不久可望出版。

这篇录音访问记，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金榕采访，于1982年8月在电台主持的《历史与文物》节目中播出。现将访问记全文发表，以寄托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荣孟源同志的深切怀念。——编者



本刊讯：荣孟源同志夫人于淑芬及其子女已将荣孟源生前所珍藏图书两万册，捐献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所领导决定，将荣孟源同志这批《巨山藏书》，另辟专室，供研究阅览。



荣孟源同志谈史料工作

我从事史料工作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来主要是搞近代史资料的研究工作，也编辑过一些文史资料。今年四、五月间，我到日本访问，了解日本史料工作的情况，收获不小。通过长期工作和这次出国访问使我感到，从事史料研究工作很有意义，大有可为。

有人说，编辑历史资料，从事史料研究工作，是替他人做嫁衣。乍看起来，的确是这样子，因为史料工作者的劳动成果，往往是通过历史研究的成果体现出来的。其实，只要从个人得失中摆脱出来，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史料工作者通过加工整理，把有价值的史料发表出来，为历史研究服务，不就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吗？这就象演戏一样，观众虽然看的是演员在前台的表演，但如果没有剧务工作人员在后台辛勤劳动，这戏还能演下去吗？

据我的经验，从事史料研究工作，并不象商店出售商品那样卖一样少一样，而是相反，工作做得越多、越深，收获也就越大。因为，搜集资料，要靠寻线索。当事人写出来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稿件，我们可以据此去查对核实，找同类材料，看清类似的事实，发现类似的史料。如张勋复辟的资料，你要加工处理，就必须了解还有什么关于张勋复辟的书籍和材料。这就等于给自己出了个题目，促使你去查找，去核对，不然，你怎么会想到就这一问题去有意识地进行搜集、查核工作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提供的史料越多，我们的历史知识就会更丰富。我们要有“甘为他人做嫁衣”的思想，尽量努力作好史料工作。

史料工作也有规律可循，也是一门学问，叫做史料学。有人问我，什么叫史料学？我说，我不主张谈概念、抠名词，而是喜

欢讲事实摆实际情况，史科学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从实际工作中形成的内容大概是：资料的搜集、鉴别、校勘、加工整理、编辑出版等，主要是指史料的考据。史料的鉴别、加工和校勘都是说史料的考据。文史资料、回忆录是口述史料，文史资料工作是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概言之，对资料进行收集、考据、编辑的规律和方法，就是我们所说的史科学。

史科学离不开历史研究，没有历史研究，则无法对史料进行分析和鉴别。但是，史科学主要是指史料的鉴别和考证，而不是谈史料的使用；史料的使用属于历史学的范围，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我们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科学。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反复强调：要“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即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就是我们从事史料工作的指导思想。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说：“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的运动方才能够适当地叙述出来。”我们只有按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才能做好史料研究工作。

先说收集史料，要尽可能做到系统、周密和完整，特别要重视第一手史料的收集。这次我们到日本去访问，领导交给的任务是收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前后的活动的材料，以及其他近代史资料，以补充我国资料的不足。结果，找到了不少我国所没有的资料。例如在日本九州，发现了孙中山一九一三年赣宁之役失败后在九州的活动材料。头山满在九州成立了一个玄洋社，建了一个纪念馆，馆中存有头山满、犬养毅和孙中山、黄兴的来

往信件以及反映他们之间关系的材料，有照片、报纸、题词等。在日本外务省外文所找到了一九一三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等地的活动档案。“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到东京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日本政府同袁世凯勾结，当时袁世凯请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等人出境，头山满掩护并帮助孙中山仍住在日本。日本警察厅派特务对孙的活动进行监视。警察厅规定特务将孙的活动从起床到睡觉每天写一份报告。这批报告以后作为档案由警察厅转至外务省，外务省把这些档案汇订成册。我们发现了三本，每本约一寸厚。其中对孙每天的活动记载得比一般人的日记还要详细。这批档案，对日本外务省可能用处不大，但对我们考察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却是很有价值的史料。另外，我们在日本东洋文库，找到了一九〇〇年孙中山在日本出版的一张地图，叫《支那现势地图》。这是他在—八九九年绘制的中国已修成和未修成的铁路图；其中还标明英、德、俄、法等帝国主义势力各控制的铁路线；最可注意的是孙中山把自己所设想应修建的铁路也详细地描绘在上面了。这份地图是研究孙中山早期实业建设救国思想的重要材料。最后，我们还和日本史学界、图书资料单位商定了交换资料的初步办法。

上述情况，可以作为广泛搜集资料的一个事例，说明史料收集工作是相当广泛、相当浩大的工程，我们要采取各种途径和方式从事这一工作，不论是国内、国外，不论是正面史料、反面史料，都要积极收集。要这样做，就要动员各方面的人力，将所收集到的资料，尽力选编发表。一切借口什么权力来垄断史料，把别人所找到的史料攫为己有；占有资料之后，不准别人使用；以及窃盗史料，图谋私利等等恶劣作风，都是收集史料的绊脚石。

史料工作离不开历史研究。鉴别史料，区分史料的真伪，除了熟悉材料之外，如不熟悉与史料有关的历史是不行的。不熟悉历史，不熟悉某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就无法知道这一历史，历史事件与自己所收集的材料有无关系，材料的价值就无法估

计，更无法对材料进行鉴别和考证。

搞近代史资料研究工作，必须熟悉近百年的中国史；就政协系统的文史资料工作而言，必须了解戊戌变法直到“文革”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了解这一期间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在熟悉历史方面，我主张知识面应宽一些、广一些，才有利于史料研究工作。如果搞太平天国资料，光知道太平天国，搞辛亥革命史料，只懂得辛亥革命是很不够的。要做到，搞辛亥革命资料，就把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现状、会党组织、有关野史轶闻等等都基本上搞清楚。关于清末时期的会党组织，过去有种说法：南方是天地会体系，北方是白莲教体系，这是不对的，是不了解历史情况的表现。其实，当时北方的哥老会（天地会的支派）的力量就很大，陕西等省就是例子；南方恰相反是白莲教体系。南方除天地会之外，还有白莲教体系的会道门。太平天国和天地会有一定联系，但是洪秀全是用上帝托梦的方式传达上帝的语言，杨秀清是用上帝下凡、肖朝贵是用耶稣下凡的方式来传达天父天兄的命令。托梦就是北方“梦先生”的把戏，“下凡”就是白莲教中某神附体的做法。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江西的义和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川鄂湘黔等地的神兵等等，不都是白莲教的体系吗？

要熟悉历史，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多看多问：看历史专著，看资料文献，看文史稿件；问，就是调查研究，向当事人和专家学者请教，向各方面熟悉情况的人士调查情况。我自己还有个经验，就是多看小说，从有关的小说中了解社会、事件、人物和风土习俗等。小说里的张三李四，具体的人物和情节，我一概不去管它，但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发生的事情、历史现状等等。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可以了解旧北京城里洋车夫的生活情况。搞近代史资料，搞文史资料工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不可不看。一个人的知识和阅历总是有限的，必须用各种

方法来扩大视野，丰富历史知识，为史料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在从事史料的加工整理、编辑出版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有教训。

在选择稿件篇目时，应以其史料价值为标准，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全国政协汇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至六集，我参加了一年多时间的工作。当时有几篇稿子，如回忆山西农民响应辛亥革命和组织干草会活动的文章，原是打了落卷的。有人主张这几篇文章又短，文字也不好，干脆就不用了。我说，拿来看看，不要管它篇幅是长是短，文章写得好不好，看它是否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以前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很少记载农民活动的情况，山西这几篇稿件是有价值的，终于被采用了，结果反映较好。

关于对资料稿件进行编辑加工，我一贯主张一般不轻易改人家的东西，更不要以编辑的爱好来改别人的文章。史料，有原始资料、第一手资料、口述资料（回忆录、文史资料）多是当事人的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编辑者不是亲历者，并不十分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当然作者的记忆可能出现误差，但是编辑者的判断也容易出偏差，有可能将对的误改为错的。人名、地名、订正和核实比较容易，至于记事，一般编辑者没有可能都核实考证得那么清楚。有些事情，历史研究工作者和专家名流尚且需要研究，怎么能要求史料编辑者都弄清楚呢？

一份史料，我们只要求它讲事实，只要它真实就可以了。至于文字，可以不拘形式，文言的可以，白话也可以，只要能看懂，说清楚事实就行了，不能单纯在文字上苛求。我们曾收集一批关于一九〇五年反美运动原始史料，后来进行了摘录重编，花了很大力气，出了一本书，结果受到了批评。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将原始资料、第一手资料重编为第二手资料了，使用起来反而不方便了。我们只好接受这一批评。

所谓对稿件的编辑加工，主要是指对人名、地名、明显错误